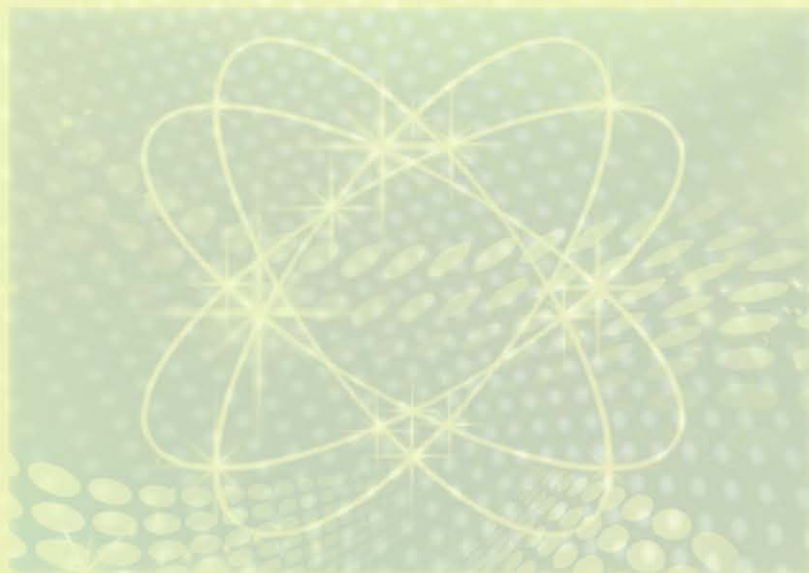


历史与文明

王炜民 著



历史与文明

王炜民 著

目 录

前 言	1
浅论弘扬中华文明的重大意义	3
论中华文明学的学术理论体系	8
从司马迁故里看弘扬中华文明	17
浅谈研究阴山文化史的意义	21
《史记》与阴山历史文化	25
浅论研究区域历史文化的文献	31
中国古代的祈谷礼	40
中国古代礼学的集大成著作	44
焦竑的文献学	52
从《四库全书》看焦竑	59
《焦氏笔乘》的文献学价值	65
论焦竑《玉堂丛语》的史料价值	71
从《养正图解》看焦竑的治政思想	76
漫话中国古代历史要籍	82
史“海”泛舟有蹊径	82
从甲骨文的发现谈起	83
金文的史学价值	83
《尚书》与石经	84
《逸周书》的成书年代	85
《诗经》与周代社会	86
“十三经”的由来	86
孔子与《春秋》	87
《左传》与《春秋》的关系(上)	88
《左传》与《春秋》的关系(下)	88
《公羊传》与《谷梁传》	89
《国语》的得与失	90
《世本》的兴衰	90
富有时代气息的《战国策》	91
内容丰富的汲冢书	92
《竹书纪年》的原本、古本和今本	92
具有杂史性质的《山海经》	93
百家争鸣与诸子文献	94
《孟子》与“民贵君轻”思想	95
兼容并包的《吕氏春秋》	95
研究先秦史的重要参考书——《绎史》	96
司马迁与纪传体	97
《史记》的史料来源	98

刘向刘歆与古籍整理.....	98
《汉书》的成书过程.....	99
博物洽闻的《汉书》.....	100
“体圆用神”与“体方用智”.....	101
荀悦的“立典五志”.....	102
曾列入“三史”的《东观汉记》.....	102
以“笃名教”为宗旨的《后汉纪》.....	103
《后汉书》在编纂上的创新.....	104
秦汉时期的简策（上）.....	105
秦汉时期的简策（下）.....	105
陈寿的“良史之才”.....	106
开创史注新法的《三国志注》.....	107
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	108
题为“御撰”的《晋书》.....	109
以“立言为事”的崔鸿.....	109
魏晋士大夫的速写《世说新语》.....	110
《宋书》的八志.....	111
为家族树碑立传的萧子显.....	112
《梁书》和《陈书》.....	112
因水证地、即地存古的《水经注》.....	113
倍受责难的《魏书》.....	114
北魏都城的写照——《洛阳伽蓝记》.....	115
残缺严重的《北齐书》.....	116
兼叙南北的《周书》.....	116
“以隋为鉴”的《隋书》.....	117
《隋志》的内涵.....	118
我国现存最早的农书《齐民要术》.....	119
《中国历史文献学》评介.....	120
伪书研究的新成果.....	122
成石勒基业的谋主——张宾.....	123
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一面旗帜.....	129
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	132
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研究的贡献.....	135
胡适何如人？.....	138
一代史学宗师.....	153
学者的楷模 师德的典范.....	160
黎虎先生的学术道路与史学成就.....	166
附 录.....	174
一部研究古代礼俗的力著.....	175
一部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的教科书.....	178
弘扬中华文明的成功尝试.....	181
仓有备粟，可以待凶饥.....	183
中华文明的开拓创新之作.....	186
一部弘扬中华文明的著作.....	192

追寻“达兰喀喇”的历史与文化.....	196
地域文化研究的开拓创新.....	199
阴山文化史研究评述	

前言

这是一本论文集，所收录论文的内容均与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相关联，故题名为《历史与文明》。

本人 1978 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开始踏入史学大门。1982 年毕业即从事高等教育工作，一直致力于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三十多年来，在二十多种报刊杂志及学术专题论文集发表了文章一百余篇。现已年届花甲，对自己的史学道路略作回顾与小结，将曾经发表的文章辑集出版，当为人之常情。历年所写文章尽管基本与本人从事的历史专业相关，但也写过一些临时应邀之作，全部收入文集似嫌内容过于宽泛，且文集分量不宜太大，故当有所选择。经过斟酌，下面所述几类文章本文集没有收录：其一，与本文集主题不太贴切的文章。例如，本人自 1994 年至 2011 年连续担任包头师范学院二级教学单位行政负责人（职务名称随着事业的发展有所变化，包括历史系副主任、历史系主任、历史文化系主任、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历史文化与管理学院院长等，实际是同一岗位）跨过了 18 个年头，其间因工作需要写过一些教育管理类的论文，此类文章与“历史与文明”有些距离，故未收录。其二，本人历年独撰、合著、主编、参编著作已出版 20 多种，其中有些著作的某些章节可以独立成篇，曾抽出略加整理在期刊发表，此类文章因在原著中完整保存，故未收录。其三，有的文章与他人合作或指导研究生完成，二人署名发表，不属于本人独立写作的成果，故未收录。其四，以前发表的文章，今天重新审读，相较而言，有些文章或论题意义不大，或论据不够充分，或结论似欠全面，或内容较为单薄，或介绍知识为主，或属于动态综述，为控制文集篇幅，亦未收录。

收入本文集的文章，大体说来，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谈文明。本人 1990 年参加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编撰工作，负责《中国古代礼俗》一书的撰写，该书于 1991 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礼俗》1994 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繁体字版，1997 年商务印书馆、2010 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又出修订本），之后主要研究方向转向中国文化史。“文明”与“文化”两个概念相重叠的地方很多，在中国的各类辞书中大多都有互为解释的义项，往往被视为同义词，尤其在理论研究中难以截然划分。然而，这二者毕竟不完全等同，还是有所区别的。一般说来，文化可包括正、反两个方面，而文明主要包含正面的内容。研究中国文化史主要应倡导正面的内容，故本人 1999 年主编的属于中国文化史性质的著作《中华文明简史》便以“文明”题名，其中将“中华文明”定义为：“指包括当代 56 个民族以及曾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古代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见《中华文明简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前言》第 3 页）广而言之，本文集中的论文大都属于研究中国文化史的范畴，如再细分，有关中华文明、中国礼仪文化、阴山文化史等内容，可列入探讨“文明”一类。

二是论文献。本人从事高等教育工作讲授的第一门课程，是《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后改称《中国历史文选》），1989 年参编《中国历史文献学》（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 8 月出版）一书后，又开设了《中国历史文献学》课程。两门课程密切相关，且一直是本人的主讲课程，故本人贯穿始终的一个研修方向是中国历史文献学。由于教学与科研的需要，本人浏览了一些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典籍，也写了一些论述文献的文章。其中 1986 年至 1990 年，应邀在《宁夏日报》理论版开设了“漫话历史要籍”专栏，介绍中国古代历史典籍，断

断断续续发表了 40 多篇文章。因报纸容量的限制，按编辑要求，每篇均为千字左右的短文，故对每一历史要籍只能择一特点略加论述，无法展开评论。即使这样，因压缩版面之需，文章发表时也多经编辑删削。这些短文内容并不全面，多为归纳学界通行的观点且点到为止，严格说来算不上学术论文，但好歹成一系列，记录了本人阅读古代典籍及相关文献的心得体会，加之一般报纸难以留存，故收入本文集。需说明的是，原计划共写百篇系列短文，将中国从先秦至清代的历史典籍择其要者逐一简要介绍，但由于报社工作调整，文章写作至南北朝专栏中断，未能按计划全部完成，想来令人略感遗憾。另关于《齐民要术》的短文，亦为专栏而写，因专栏停刊，后发表于《历史学习》杂志，也一并收录于此。1999 年本人回到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在古籍研究所师从刘乃和先生访学一年，研修重心是明代学者焦竑及其著作。之后发表了几篇研究焦竑文献学的论文，现集中收入本文集。因几篇文章分别发表，均需对焦竑有所介绍，故有些内容略显重复，但为存原貌，未作删改。（本文集有关中华文明、阴山文化的论文也存在类似情况。）

三是评人物。历史主要反映的是人类活动的历程，历史学自然离不开对人物的研究，本人也因各种机缘写过一些评论人物的论文。其中有关张宾的一篇，是本人的本科毕业论文，虽然还不够成熟，但毕竟是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可反映本人走上史学研究道路最初的状况。关于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的三篇文章，是当年为友人拟编撰的二十世纪杰出人物专书而写，但该书未能出版，故陆续发表于期刊。评论胡适的一篇，是阅读黎虎先生主编的《黎昔非与独立评论》（学苑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出版）后有感而发。陈垣先生是刘乃和先生的老师，而本人又是刘乃和先生的入室弟子，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撰写怀念前辈学者和恩师的论文自在情理之中。黎虎先生是本人的授业恩师，本科毕业论文即由黎先生指导，毕业后仍然保持密切联系，三十多年来，得到了黎先生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撰文探讨先生的学术道路及史学成就当然是作为学生义不容辞的职责。上述人物尽管有古有今，且不属于同一类型，但均在相关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均可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故将这几篇人物评论收入本文集。

上述三个方面虽然各有重心，但又互有联系。谈文明要有史料支撑，自然会涉及文献；论文献不能脱离文献学家，不免谈及人物；评人物必论其历史作用及贡献，又与中华文明的发展相联系，三者实际难以截然区分。强行划分并非不可，只是未必科学，故本文集只是将所收论文按三个方面内容大体排列先后，不再作出明显的分类。

本人历年出版的著作，有些曾引起学界的关注，或对某些内容加以引用，或对某些著作进行评论。本文集收录了几篇学界同仁对本人撰著及主编著作的书评，作为“附录”放在论文之后，以利读者诸君对本人的治学状况有较全面的了解。

本文集收录的文章，是不同时期发表在不同的刊物上，论文格式不尽统一，为存原貌未作统一加工处理，特此说明。

本文集的出版，得到了河北人民出版社李世琦先生、王岚女士的大力支持，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王炜民

2013 年 1 月 4 日

浅论弘扬中华文明的重大意义

摘 要: 中华文明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创造才能和聪明智慧,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和精神风貌。在走向世界的今天,弘扬中华文明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思想意义。

关键词: 中华文明; 民族精神; 爱国主义; 素质教育; 历史智慧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坚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智慧,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些文明成果简言之,即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巨大财富。中华文明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创造才能和聪明智慧,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和精神风貌。其内容也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更新,向前发展。因此,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弘扬中华文明,《阴山学刊》专门设立了“中华文明研究”专栏,对中华文明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和较为深入的探讨,这是一件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大好事。在“中华文明研究”专栏创设之际,笔者再提“弘扬中华文明的意义”这一似乎尽人皆知的话题,并加以特别强调,是希望引起全社会更加广泛的重视,也祈望学术界和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对专栏给予大力支持。

下面,就笔者管见,对弘扬中华文明的意义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不妥之处,还请方家指教。

一、深远的历史意义

弘扬中华文明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可从学习了解中华文明史和研究总结中华文明史两方面加以理解。

中华文明发展史是整个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中华文明史的意义与学习历史的意义相同。历史有其承继性,无法人为地割断,今天的中国与昨天的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江泽民同志 1996 年 6 月 21 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的走向未来。”我们学习历史,并不是单纯地为了了解历史知识而学习,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现实社会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对将来的发展有一个正确地把握。

例如,我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全面推行计划生育。2001 年 12 月 29 日经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家主席江泽民签署第 63 号主席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地位。那么,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生育呢?这是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实行的一项重大政策,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我国古代有着强烈的宗嗣继承、传宗接代的观念,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普遍认为,多子多福,人多力量大,因而历来鼓励繁殖人口,人口增殖速度很快。至 20 世纪 50 年代末,我国人口达到 6 亿,占到世界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而且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初期至 70 年代中期、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中期,连续出现三次生育高峰,约 40 年间人口总量又翻了一番。可是,我国拥有的可耕地面积只占世界可耕地面积的 7%。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是最重要的基本国情,因此实行计划生育事关民族兴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是形势所迫,也十分必要。近 30 年来,我国人民经过艰苦努力,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

快增长，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转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人口过多仍是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由于人口基数大，未来几十年，我国人口总数还将持续增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矛盾依然突出。坚定不移地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继续抓紧抓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采取综合措施解决人口问题，为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仍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的法律保障——祝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载《人民日报》2001年12月30日第六版）因此，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并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就是在了解历史、分析现状基础上，正确把握未来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

弘扬中华文明必须研究中华文明发展史，而研究和总结中华文明发展史又对传承中华文明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历史悠久，是一个数千年来始终保持统一和持续的文化形态的古国。“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下来，这同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给白寿彝同志的贺信》，《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我国自古以来一直有“治史”的传统。我国的史学起源很早，在文字产生之前先民已有了原始的历史意识，最晚在商代已有了史官。至周代已有了史鉴的观念，《尚书·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意谓我们不能不以夏为鉴戒，也不能不以殷为鉴戒。之后“多识前古，貽鉴将来”（唐高祖《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唐大诏令集》卷81），成为历代史家的共识，也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任务。与此相关，还有了“易代修史”的传统。一个朝代灭亡以后，后继的新朝代为了总结历史，借鉴往事，吸取经验教训，都要给上一个朝代编纂历史。唐修隋及前代史，宋修唐史，元修宋、辽、金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这一修史的优良传统绵延不断，经久未绝，两千多年来积累了丰富浩瀚的“二十六史”和其他汗牛充栋的历史著作，构成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财富。这一“治史”的传统和由此而产生的大量成果，不仅保证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不致中断，而且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扬光大。这不只令中国人自豪，也为近代以来西方学者所推重。黑格尔指出：“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历史哲学》中文本，三联书店1956年出版，第161页）今天，我们弘扬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保持“治史”的优良传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发掘历史宝库，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以推进祖国的建设事业，更好地迈向未来。因而，弘扬中华文明所具有的深远的历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二、重要的现实意义

弘扬中华文明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也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认识。

第一，弘扬中华文明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向整个世界敞开了国门，与国际交流日益广泛。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外开放，加入世贸，是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主动参与国际竞争与发展的需要，必将对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和进步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但是，任何事物有利即有弊。对外开放引进了国际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同时也涌入了一些西方消极、腐朽的东西，带来了一些难以避免的问题。例如，我国曾以“无毒国”享誉世界30年，但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世界毒品消费问题的日益严重，境外毒品逐渐向我国渗透，并愈演愈烈。我国逐步从毒品过境向消费与过境并存发展，国内毒品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据报道，截至2001年10月底，全国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达90.1万人，其中滥用海洛因人数高达74.5万人（《文摘报》2002年3月14日第一版），涉毒县、市、区已有2084个

(《人民日报》2001年8月28日第七版)。再如,像“瘟疫”一样在世界范围内滋生蔓延的邪教,也影响到了中国。李洪志领导的“法轮功”,与国外的“大卫教”、“奥姆真理教”、“太阳圣殿教”、“人民圣殿教”等邪教一样,都是社会的毒瘤。他们编造歪理,制造恐怖气氛;神化活的教主,实行精神控制;玩弄各种骗术,大肆聚资敛财;目无道德法律,破坏社会安宁;泯灭亲情人性,戕害他人生命。因而,近年来打击邪教也成为我国的紧迫任务。

尤其应指出的是,有些人过分看重西方国家发达的生产力、优越的工作条件和富裕的物质生活,忽略了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观,从而妄自菲薄,盲目崇洋,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一概否定,主张“全盘西化”。要知道,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决定因素实质上是现实的国家利益和国家间的力量对比。西方某些国家借全球化的潮流,向别国强行推行自己的思想意识、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出于其政治霸权和经济垄断的需要,并非善意的举动。他们多次用“人权”问题向中国发难,对邪教头领李洪志给予支持、庇护,这些都是十分明显的例证。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经济发展与精神的健壮是灵与肉的关系,缺一不可。中华文明是民族灵魂存在的土壤,决不可自毁根基。这是我们在走向世界的今天特别强调弘扬中华文明的重要原因。

目前,经济全球化成为时代的潮流。全球化的趋势是由科学技术的革命性飞跃、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进步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它将使国与国、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但是,文明多样性并不会因为全球化而消失。这是因为,由于政治制度、社会发展、历史背景、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各异,各国创造的文明有其自身的鲜明特点。“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体现了人类的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和遗产。各种文明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各有其长处,各国的人民都曾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过贡献。文明的多样性是世界充满活力和不断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尊重和发展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借鉴、交流、融合,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伟大动力。”(宋健《文明对话:世界的共同追求》,《人民日报》2001年9月21日第七版)

中华文明是在中华大地上成长起来的本土文化,尽管也在随时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中的先进成分,但始终保持着中华民族鲜明的文化特色。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在其发展过程中与时俱进,不断创造、更新,已经成为中国人行动和心灵的支点,是我们民族自信心的基石。正如杨雪《凝望历史》文中所说:“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总会重新被激活,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化腐朽为神奇,而变动的社会现实又总是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增添新的养分,使其具有时代的气息。世界上还有哪种文化比中国的文化更有生命力,更博大精深?”(《人民日报》2001年7月17日第十版)因此,弘扬中华文明不仅是维护本土文化、抵制外来不良影响的需要,而且也是中华文明自身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

此外,弘扬中华文明还有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意义。全球化使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更加广泛,联合国还把2001年确定为“不同文明对话年”。中华文明在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撰写的《文明对话:世界的共同追求》一文中提到:“最近一位美国朋友写道:李约瑟揭示了一个历史上最大的迷惘:当代世界人类文明是由中国历史文明和欧洲文明综合而成。没有中国的造船技术、指南针和其他发明创造,欧洲17世纪以来的各种发明创造和产业革命都根本不可能发生,也不会有英国的骑士时代。”(《人民日报》2001年9月21日第七版)因而,中国在文明对话、文化交流中应起到重要的作用。2001年9月举行的第三届“柏林亚洲太平洋周”,我国作为主宾国,以丰富多彩的节目成功地举办了在国外规模最大的文化交流活动。其中包括上海昆剧团的《琵琶行》,中央实验话剧院的话剧,内蒙古合唱团和广东现代舞蹈团的演出,陕西的社火表演、皮影戏,山东的青州石刻佛像展、淄博花灯,以及中国当代艺术展等,都受到了热烈欢迎和广泛的好评。这也是展现我国艺术瑰宝的魅力,弘扬中华文明优秀成果的重要活动,体现了我们对中华文明优越性的自信,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关怀。

第二，弘扬中华文明是加强素质教育的需要。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这是我国文化建设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近年来，加强素质教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是，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和物质财富的高速增长，社会对科学技术的极大重视和对物质利益的强烈追求，产生了追逐物质利益，淡化人格精神的倾向。反映到素质教育中，就是科学技术素质的培养备受青睐，而人文道德素质的提高受到冷落。然而，没有正确的信念和崇高的理想，文化技能的学习将缺乏强大的内在动力；没有人文科学精神作支撑，人们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就难免迷失方向，走弯路，犯错误。报载，清华大学电机系四年级学生刘海洋，为了验证“笨狗熊”的说法能否成立，在2002年1月29日和2月23日，先后两次把掺有火碱、硫酸的饮料，泼在了北京动物园饲养的狗熊身上和嘴里，造成了3只黑熊、1只马来熊和1只棕熊受到不同程度的严重伤害。刘海洋在数理化方面的学习能力一直为人瞩目，曾代表清华大学赢得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二等奖。但是，他却对爱护动物，珍惜生命这一基本的道德准则缺乏起码的认识。（《硫酸泼熊事件引发的社会思考》，《文摘报》2002年3月3日第二版）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因此，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在科技飞速进步、市场经济发展、网络时代到来、各种思潮激荡的今天，特别要大力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2001年10月中共中央还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着重提出要引导人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报效人民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祖国利益、民族尊严为最大耻辱。这也是在新形势下提高全民素质的重大举措。

提高人文素质，离不开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和对中华文明的学习。江泽民同志1999年4月25日在祝贺白寿彝教授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的《贺信》中指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奉献力量。”（《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给白寿彝同志的贺信》，《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我国真正兴盛发达，其最强大的内在动力是爱国主义，而爱国主义就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有着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传统，每一位爱国志士都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有着为争取自己祖国的独立、富强而英勇斗争的献身精神。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是一部外侵内腐、多灾多难的历史，但也是爱国主义精神大放异彩的历史。从鸦片战争起，经过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华民族进行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涌现出无数伟大的爱国民族英雄。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民族的独立和祖国的统一。今天，我们大力弘扬中华文明，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就一定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

三、深刻的思想意义

弘扬中华文明还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这是因为，弘扬中华文明就要使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了解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感受前人的聪明才智，学习前人的优良品德和创造精神，这无疑将起到开发人的心智、启迪人的思维、给人以历史智慧的作用。

例如，弘扬中华文明有利于进一步加深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历史的道路尽管十分曲折，但总是向前发展的。正如李大创《史学要论》中所说：“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历史观。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

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1980年据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校印本）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灾难，但我们没有亡国，而且越来越富强。这是因为我们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始终坚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只要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就一定能够冲破黑暗，迎来光明。与此相关，当人生遇到挫折时，只要是因坚持真理而受到打击，就要坚定信念，挺过难关，真理终将战胜谬误。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家马寅初先生经过调查，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于1957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了以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为中心的“新人口论”和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的经济理论。但从此他被免去了北京大学校长等职务，遭到了长达20多年的错误批判。可是马老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不屈服，不悲观，以髦耄之年，坚持到了云开雾散，“新人口论”和综合平衡的经济理论被社会肯定的新时期。1979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恢复了他的名誉和职务。

马寅初先生在巨大的压力面前，能够保持正常的心态，并且长命百岁，有所作为，是因为他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有正确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这一点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传统。汉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汉书·司马迁传》）而司马迁自己更是忍受屈辱，发愤著史，成就事业的典范。司马迁出生于史学世家，自幼钻研文史，成年壮游天下，学识十分渊博。其父司马谈计划效法孔子《春秋》，写一部记载春秋以来历史的著作，但目的未能实现，临终嘱托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后，秉承父志，饱读“石室金匮”的国家藏书，开始了著述大业。但就在此时，祸从天降，司马迁由于为寡不敌众被迫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腐刑。但他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忍辱负重，发愤著述，以毕生精力最终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成就了千秋不朽的伟业。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智慧，对于正确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人生都具有巨大的借鉴作用。正如瞿林东教授在谈到中国史学时所说：“从比较具体的层面看，不论是关于自然的认识如天文、地理、生产活动等，还是关于社会的认识如民为邦本、治国安民、法制、教化、移风易俗等，都积累了丰厚的历史智慧。历史智慧是同现代科学知识、认识水平、实践能力相对待而言的；但是，人们不应当、也不可能割断二者之间的联系，正如人们不应当、也不可能割断历史一样，而任何一个人（作为社会的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都不能不受到历史智慧的启迪。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历史智慧之光在未来的社会里仍将放射出灿烂的光华。”（《传统史学与未来社会》，《文史知识》1999年第11期）

总之，弘扬中华文明意义重大，全国人民，特别是学术理论界，都应把弘扬中华文明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并为之做出应有的贡献。

（原载《阴山学刊》2002年第3期）

论中华文明学的学术理论体系

摘要：中华文明应成为专门之学，其学术理论体系主要有基本理论、主要内容、发展历程三个方面。中华文明学的基本理论至少应包括基本概念、主要特点、少数民族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作用、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等。中华文明应包含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四方面的内容。龙山文化时代揭开了中华文明史的序幕，夏代中华文明正式形成，之后勤劳而富于智慧的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关键词：中华文明学；理论体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

近年来，“中华文明”四字，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以及日常对话中使用频率很高，但大多是当作一个词使用，很少当作一个学科门类对待。而以“中华文明”标名的论著，其概念也大多等同于中国文化或中国历史，未能关注“文明”与“文化”的区别。特别是专门研究中华文明学术体系者更是颇为罕见。学界对于学术意义重大、研讨较多的问题，历来有倡议成为专门之风气，如经学、儒学、佛学以及甲骨学、金石学、敦煌学、故宫学等等。笔者以为，为了更好的从学术理论层面弘扬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应该成为专门之学，而且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中华文明”也有资格成为专门之学。因而对中华文明的学术体系从理论上进行探讨自然很有必要，本文就试对中华文明学的学术理论体系略陈浅见。

中华文明学的学术理论框架至少应包括基本理论、主要内容、发展历程三个方面，简要叙述如下。

一、中华文明学的基本理论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其基本理论涉及面也很宽，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1、基本概念

“中华文明”使用频率很高，但其定义和内涵，特别是“文明”的概念，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华一词，是由“中国”与“华夏”二名复合而成，大约出现在魏晋时期，其含义在不同阶段有所差异。“中华”在现代的词义，既可指中国，也可指中华民族。而“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包括当代 56 个民族，当然也包括曾经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古代民族。

谈及“文明”不能不提及“文化”，因为二者词义非常接近，在各类辞书中大多都有互为解释的义项，往往被视为同义词，尤其在理论研究中难以截然划分。然而，这二者毕竟不完全等同，还是有所区别的。我们认为，“文化”与“文明”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纵向而言，从历史发展阶段看，“文化”是人类相对于动物状态的一种禀赋，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而“文明”是相对人类自己的野蛮状态而言的，是人类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第二，横向来看，在实际运用中二者词义包含的范围不尽相同。一般说来，文化可包括正、反两个方面，而文明主要包含正面的内容。

因此，关于“中华文明”，我们可以作这样的表述：中华文明是指包括当代 56 个民族以及曾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古代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优秀成果。

2、主要特点

只有把握了中华文明的特点，才能认清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才能扬长避短，让中华文明光照千秋，因而中华文明的特点也是基本理论问题之一。中华文明的特点主要包括：

其一，源远流长。中华大地是全世界最早进入人类文明的地域之一。中华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 7000—5000 年以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 6000 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 26 个文明形态，但是只有中华文明是延续至今而且从未中断过的文明。这一奇迹足以把中华文明同其他文明区别开来，如此悠久的历史，显示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特点。

其二，崇尚统一。中国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各民族相互融合，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形成了崇尚统一、维护统一的价值观念。特别是两千多年前，中华先民建立了幅员辽阔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大一统”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虽然经历过改朝换代、政权更迭，出现过地方割据，遭遇过外敌入侵，特别是近代史上曾饱受外国列强的侵略和瓜分，但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历次大一统局面的实现，都奠定积聚了促进中华文明发扬光大的物资基础和精神力量；而每一次分裂和战乱，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和痛苦。因此，追求大一统的理想境界，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原则和目标，保卫大一统的领土完整，维护大一统的社会稳定，则被视为民族的最大权利和责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始终是历史的主旋律。

其三，天人合一。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上曾经数千年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天”是指自然界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天人合一”讲究因人成事，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顺应自然，师法自然，取乎自然，与自然相通相依，协调一致，和谐共处，具有朴素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中华文明中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对于养身，对于治国，对于处理国际关系，对于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都是有价值的，有现实意义的。

其四，以人为本。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一直站在人类文明的前沿，它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文明在世界文明宝库中是屈指可数的。它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从古到今一直传承下来，孕育着炎黄子孙，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文明的人本意识突出人的主体性，主张把人当人来看待，提倡重视民意，与民同乐，这是尊重人性、尊重人的体现，也是古代民主思想的萌芽。固然，中华传统的人本思想不同于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人本观念是通过对人性的肯定来论证人格尊严，民主观念是通过对人权的肯定导出人格平等。人性与人权、人本与民主具有相通性，但不能等同。不过，人本思想仍然可以成为民主思想的基础。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有必要从传统的人本思想中吸取有益养分。

其五，注重实用。中国传统文明以解决社会人生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执着于对政治、伦理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问题的探求。这种重实用的倾向，形成了中华民族经世致用的传统，强调投身现实、奋发进取的努力和作为。中国人立身行事讲究脚踏实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治国安民重视现实的民情，解决现实问题，并以历史的实际经验教训为借鉴。日常生活则从家庭人伦和自己的职业出发，重视道德实践，老老实实地做人，在现实中履行自己的义务，实现自己的价值。因此，中华民族的性格总是显得实实在在，既不好骛虚幻的彼岸世界，也难激发起那种非理性的宗教狂热。

其六，强调道德。崇尚道德是中国古代各家各派的共同倾向。儒家充分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性。首先，有无德行构成人们人格评价的直接依据。一个人若无崇高的道德，即使贵为王侯，也得不到万民敬重；反之，有了崇高道德，即使穷困潦倒，也能得到万民称颂而名垂千古。其次，道德还是人们设身处地的行为准则。儒家认为仁义之心是人之生命的根本，失去仁义之心也就等于丧失生命之根本。再次，道德构成文化教育的中心内容。儒家重视教育，但他们所论教育主要不是知识教育，而是伦理教育，如何做人的教育，儒家的愿望是通过道德教化以造就志士仁人的理想人格。最后，道德也是国家兴衰存亡的重

要标志。其他各家，其所谓道德的内涵或有不同，但对德的推重则并无二致。而从汉代定儒家为一尊以后，这种重德传统就得到确立并不断被强化，由此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

总之，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兼容并蓄，丰富多彩，是世界上唯一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明，是东方文明的杰出代表，是人类文明最辉煌的组成部分。中华文明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由于受中国社会文明发展道路以及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地理结构的影响，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它是中华文明内在特质的集中表现。

3、少数民族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所有成员共同创造的。在数千年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人数众多、经济文化发展较高的汉族为创造中华文明起了较大作用，其他少数民族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是相当突出的。

其一，政治方面。中华文明的发展，依托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我国自夏商周开始建立了数十个王朝和政权，而这些政权有许多就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占据一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相对中原而言，大多处于我国的周边地区，他们为开发、建设和保卫祖国辽阔的边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曾经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给中国政治文化输入新的活力，对于中华文明的贡献则更为突出。如成吉思汗时期形成的蒙古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少数民族为统治民族的全国统一政权——元王朝。元朝的统一，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为南北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铺平了道路。再如满族建立的清王朝，消除了“三藩”割据势力；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使台湾再也不是漂离于中央政府的一座孤岛；在东北通过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遏止了沙俄在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活动；在西北平定了噶尔丹叛乱，把外蒙三十旗和内蒙四十旗牢固置于清政府管辖之下，结束了阿尔泰山以东、恰克图以南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另外设西宁府，安定了青海；派驻藏大臣，加强了对西藏的有效管辖；在川、桂、滇、黔等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官员由中央政府直接委派，改变了以往土官、土司世代承袭，权力极大，俨然是个独立王国的状况。这一切举措，完成了空前的统一中国的大业，为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其二，经济方面。中华文明的成就，还表现为社会经济的进步，这方面少数民族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国古代有史以来就分为两大经济类型，一是以农业为主兼养家畜，一是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经济主要是由少数民族承担的，就是我国古代主要的生产类型农业经济少数民族也有许多独特的创造。如新疆维吾尔族兴建的“坎儿井”即是较为突出的例子。在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手工业方面，我国少数民族更有许多历史悠久并独具特色的创造。例如，流行于壮族、傣族、侗族、土家族等许多少数民族的织锦，苗族的刺绣，东乡族、柯尔克孜族的擀毡，彝族、白族的漆器，瑶族、布依族的蜡染，以及海南的椰雕，新疆和阗的玉雕，都是少数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其三，科技方面。少数民族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有着重要的贡献。我国古代青铜文化相当发达，这不仅表现在中原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也反映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如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器表现了古代蜀人高超的青铜器铸造技术以及在青铜造型艺术方面非凡的创作才能。我国古代天文历法颇为发达，其中也有少数民族天文历法学家的贡献。许多少数民族还创造了适用于本民族的历法。如藏族使用的藏历、云南傣族的傣历、彝族的彝历、湖南苗族的苗历等，均自成体系，各具特色，都是中华文明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果。此外，在我国医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发展史上，也都有少数民族做出的成绩。

其四，文化艺术方面。少数民族在文化艺术方面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尤为突出。如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在本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创造和使用文字。其中在历史上曾经使用，而今废弃不用的也近 20 种，这些古文字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是研究各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资料。现在仍在使用的少数民族文字，有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傣文、彝文、

锡伯文、朝鲜文等。这些文字都有悠久的历史，不仅是表达语言和书写的工具，也是显示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是中华文明成果的组成部分。用少数民族文字撰写的史学著作都是宝贵的历史文献，而少数民族创作的大量具有鲜明民族色彩和风格的文学作品，均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和史学价值。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音乐舞蹈传统，而少数民族更以能歌善舞著称，在他们中间流传着大量的歌曲和舞蹈，是中华文明艺术宝库灿烂的奇葩。

我们今天探讨少数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不仅有利于全面认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而且对于正确认识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端正我们今天对待少数民族问题的态度，也具有现实意义。

4、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

中华文明从商周以来到 16 世纪以前的 3000 多年间，曾创造出了世界上最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并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一事实，国外的一些学者也予以认可，如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安田朴认为：在西方“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之前，中国文明非但不比欧洲文明逊色，反而还要先进得多。中国对全世界、全人类做出过巨大贡献，以至于今天的西方文明中仍有借鉴华夏古老文明的成分。^[1]这可从三个方面说明。

其一，发达的古代物质文明。这既体现在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方面，也体现在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古代科技发明创造等方面。农业是文明出现的重要保证，大约从距今一万年到五六千年前开始，在西亚、南亚、东亚和中南美洲先后形成了几个各具特色的农业中心。其中，中国所在的东亚大陆因远离其它文明中心而自成一体，是世界上最早的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农耕生产关系密切的家畜饲养业，在我国开始出现也很早，至今大约有八九千年的历史。其中，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驯养家鸡和猪的国家。中华农耕文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农业科技理论。我国古代农学著作之多，为世界各国之冠，共有 370 多种。中国古代的手工业一直领先世界。如在冶金技术方面，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是世界上公认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大规模生产铸铁的国家。在陶瓷方面，我国素有“瓷器大国”和“世界瓷国”的美称，瓷器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发明之一，瓷器的生产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我国的造船技术也是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自宋代以后指南针用于航海，我国古代的远航事业更是遥遥领先。明初郑和七下西洋，远达非洲东海岸，堪称历史壮举。古代中国科技发展的各个领域和部门，都曾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卓越的成就，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据 1975 年出版的《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明代以前，世界上重要的创造发明和重大的科学成就大约 300 项，其中属于中国的大约 175 项，占总数的百分之 57 以上，我国古代领先于世界的科技成就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建筑等方面均表现得十分突出。

其二，辉煌的古代精神文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和无数的哲人先贤，以其丰富的精神成果不断充实着世界思想文化宝库，创造出了世界上独具特色的精神文明。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费正清先生指出：“对于艺术、文学、哲学和宗教领域的人文学者来说，中国的传统社会是西方文化的一面镜子，它展现出另外一套价值和信仰体系、不同的审美传统及不同的文学表现形式。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中国在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及历史学方面的文献记载，就某些时代或某些领域而言，远比西方丰富、详实”^{[2] (P2-3)}。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博大精深，春秋战国时期即出现百家争鸣，儒学在与佛学、道家思想的对立与融合中，历二千多年不衰。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以家庭为本位，强调自身道德的修养与品格的完善，它的一些优秀内容，如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勇毅力行等，至今仍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3]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精粹宏篇不胜枚举，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异彩纷呈。

像元代戏剧家关汉卿，其作品比晚于他3个世纪的英国戏剧之父莎士比亚几乎多出一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属于古代世界首屈一指的最伟大的戏剧家。中国古代艺术美不胜收，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书法等优秀作品，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其中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而汉字作为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之一，是至今世界上仍在通行的最古老的文字。中国古代史学之发达，史料之丰富，史学理论之丰厚和史学体例之完备，是世界仅有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保存历史遗产最丰富、最完整的民族，在近代以前，中国史学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史学。中国古代教育事业兴旺发达，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像孔子那样具有深远影响的教育家，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其三，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影响。古代中国，作为东方文明的中心，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影响深远，贡献巨大。古代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是逐步发展的。首先是周邻的国家和地区，如朝鲜、日本、东南亚，以后逐渐扩展到印度、波斯、阿拉伯，最后是欧洲、东非和北非。与之相适应，中国古代文明先后出现了东渐和西传的局面。在历史上相当一个时期内，中华文明与亚洲某些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文明的关系，达到了十分密切的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国家的文明发展进程。如中国的造纸方法，在公元4世纪时，就已传入朝鲜。朝鲜古代的建筑深受中国影响，新罗的都城平壤，就模仿隋唐的长安、洛阳，分宫城、皇城和外城。从秦汉到隋代，从中国移植到日本的原始工业有织丝、制陶、造船、炼铁、皮革、香料、漆器、琉璃、油脂、酿酒、造纸等。日本是最早较为全面地学习和模仿中国唐代制度文明的国家。日本大化革新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唐代的先进制度，确立适应当时日本封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个方面的制度。此外，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印尼、文莱、斯里兰卡、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都比较早地与中国建立了友好往来关系。中华文明都不同程度地传播到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国古代文明对东方世界的影响，是广泛、博大、深远的，它们至今还保存在东方各国特别是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语言、文字、思想、宗教、文学、艺术、饮食、服饰以至于风俗习惯里。中华文明对欧洲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中国的物质文明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和近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贡献是世所公认的，可以说中国古代科技起了开启西方近代文明先河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大杠杆。”^{[4] (P427)} 中国的精神文明，如伦理哲学、政治理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对欧洲的启蒙主义运动和不少重要的思想家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伏尔泰在自己的政治历史著作《风俗论》中，就以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为根据，批判教会的蒙昧主义，盛赞中华文明。

当然，对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地位的认识，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既要看到他辉煌灿烂的一面，为此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又要正视近代以来的落后，勇于和善于学习西方文明中的有益成果，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迎头赶上，再造历史的辉煌。

二、中华文明的主要内容

中华文明包含的主要内容，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的进步，不断充实和完善的。关于“中华文明”，我们曾作过这样的表述：“是指包括当代56个民族以及曾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古代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5] (《前言》P3)} 这里将中华文明的成果分为两类，是因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始，就既有物质生活的需求，也有精神生活的需求，为满足这种需求进行的社会生产也包括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两个方面，而社会生产的成果当然可大